



晏杰雄:您认为文学教育的内涵和功能是什么?

欧阳友权: 在一定的教育体制内,大学里将文学作为一门课程、一门专业、一门学科的制度化教育是文学教育。“文学教育”是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一部分的一种系统的专门的教育、精英的教育、实用的教育,内容包括课程配置、教师配备、教材选择、考试制度、学生来源等等。

文学教育与大学人文教育、与高等语文教育、与中学语文教育、与大学文学专业教育有关系,又有区别。大学文学教育是以大学各科学学生为对象,以文学经典为中心,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学素养、增强大学生人文教养为目标的崭新教育理念。

文学教育有很多的功能,我认为要把文学文本的历史性、审美性、社会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文学教育在大学教育体系中的意义正在被逐渐削弱,面对功利性追求,教学对象在不断地追问这类课程的存在意义,而文学教育的价值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拷问。文学教育的使命从大处来说是涵养人类的精神自由境界,从小处来说是个体人格形成的重要支架。审美教育与文学教育之间构成了一种天然的联系,从语言出发,沿着人类生活图景的理想性书写,由径通幽地回到审美教育,是文学教育的一种必然结果。在全球化电子媒介时代,文学教育的对象和形态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文学的内涵和功能没有变,也不应该变,那就是文学教育始终是人的心智教育、情感教育、人文精神和生命意义的教育。不管是传统的文学经典,还是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媒体文学,都离不开文学的逻辑各逻辑支点。

晏杰雄:您认为国内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欧阳友权:文学是主体审美意识的符号化显现。文学是美学、文学是心学、文学是情学,然而,工具化、模式化、标准化、统一化的文化教育架空甚至隔绝了人们对文学的“人”、“心”、“情”的直接的感受、体验、领悟、探究,文学变成一堆僵硬的知识、理论、话语、概念、定义、公理、规则、方法。

近年来,关于当前教育制度的弊端和大学的问题,人们已谈论得很多,但与理工科教育相比,现行教育制度的弊端和大学的问题在文学教育中体现得特别典型,对文学和教育的危害也更大。随着教育和大学的不断体制化、行政化、意识形态化、功利化与市场化,文学教育对文学发

网络时代的中国大学文学教育

——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欧阳友权访谈

□晏杰雄

展的推动作用日渐衰微,甚至成为抑制、束缚、阻碍文学发展的异己力量。在此,我认为应该大力提倡用文学的感性魅力去恢复文学教育的魅力,让文学教育复归文学的本色和本性。蔡元培老早就说过:“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够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蔡元培的论述至今仍不过时。文学教育应该是人格健全性、人性丰富性、人文审美性的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的教育,而不是把人变成工具。具体来说,我认为国内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学生对学习文学的兴趣不高。其原因在于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实用主义思潮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学生在选择专业时首要考虑的是就业的难易,很少有人会真正从自己的兴趣出发。现在类似读书无用、踏踏实实做学问无用的思潮影响甚广,并有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支持。由于这些年扩招的累积效应以及人才市场体制的建立,公务员“逢进必考”,有时几千人争一个指标,大学生毕业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在一个单位和另一个单位之间迁徙,住地下室,吃盒饭,收入仅够基本生存需要,面对高房价根本无法在城市扎根,充满漂泊感和生存焦虑。在近年兴起的底层文学中甚至出现一个叫蚁族文学的流派,已把当年天之骄子纳入社会底层的行列,把大学毕业生比作城市中的蚂蚁,如蚂蚁一样渺小和卑微。这种生存焦虑和卑微感传递到在校大学生中间,就表现为他们拼命地为未来生存加重筹码,注重理工科专业学习,注重技能训练,热衷于各种应用性的证,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巨大的职业训练所。而对没有直接用途的文学等人文学科则对付过关,对提升自身人文素养基本不感兴趣。这种社会风尚对学生的想象力和文学感悟力是一个极大的损害,我发现很多中文系学生缺少诗意和仰望星空的能力,那种人类天然就有的具象感悟力和对世界的整体感不复存在。

(2)文学课教学课时、教材建设、教学手段等技术方面受限,课堂教学方式单调,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众多院校在学生就业日益严峻的压力下,不断删减文学课程或课时,增加“实用”类课程或课时。由此,“在有限的课时里欣赏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就变成‘蜻蜓点水’式的解读”。国内文学教学只是“跑马观花”,连“走马观花”都做不到。大多数学校的文学教学还是沿用“一支粉笔、一本书”的传统教学方法。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很难调动学生的文学热情,难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有的教师虽然也用课件教学,但对课件的依赖过大,上课成了教师读PPT的表演。此外,由于学生参与性不足,教学活动基本上是教师单方面的讲解和灌输。在教师一言堂的模式下,学生被动地接受大量的知识,学习积极性受到了压抑。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教师讲得无精打采或是自我陶醉,另一方面学生听得索然无味或是心猿意马。

(3)文学教师自身的人文素养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要教文学首先得懂文学、爱文学,有充盈的文学阅读体验,甚或能创作文学作品,这样才有可能洞悉文学堂奥,讲出文学韵味。一个自己都不喜欢文学、不懂文学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讲好文学课的,也不可能真正的文学教育。有的文学课翻来覆去就是讲那几部作品、那几个作家,其他知之甚少,让文学课变成干巴巴的读教案、炒冷饭,学生厌学、老师厌教也就在所难免了。目前部分地区高校教师在经济收入方面还差强人意,教学任务重,生活压力大,很多人静不下心来读书、教书,这些都会影响文学教育效果。

晏杰雄:国内大学文学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需要考试,学生要熟悉那些文学基础知识才能通过考试,拿到学分。学生原创性思想和诗性感悟受到抑制,形式主义比较严重,只要会死记硬背就行了。而国外学生学习的空间和自由度要大一些。您认为国外有什么好的文学教育经验值得我们国内大学借鉴?

欧阳友权:就我所知,世界顶级学府哈佛大学面向全校13个学院设置的核心课程,涵盖外国文化、历史学、文学与艺术、道德推理、数量推理、自然科学、社会分析,共7大类11个领域。要求本科生至少选修四分之三的学习时间选修至少7个领域,计32个学分的核心课程才能毕业,其中各个专业必选一到两门文学与艺术课程。其核心课程设置的理念是:“让每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不仅受到专业的学术训练,而且还应该受到广泛的通识教育,成为有教养的人”。美国普通高校文科的教育目标也强调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正确写作和有效交流”的能力,主干课程为文学、文化与写作。

我认为中国文学教育的首要问题出在中小学教育,中小学教育不改革,高等教育就没有希望。问题之一就是中小学尤其是中学课程理化占了太多的时间,孩子没有时间阅读文学名著等人文读物,造成人文基础薄弱。我建议高考要大量提高语文的分值。在法国,高考语文考什么?就考一篇论文。我还记得一个题目是“论笛卡尔的‘我思’”这个连哲学博士都答不清楚的问题。美国高考作文,题目“论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对科学的影响”,这样的题目要考我们的中学生,恐怕大部分人连一句都答不上来,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阅读量,也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理工类专业专业的情况也是如此。欧美国家主要强调学人文,数理化却相对简单,为什么人家上大学就行?因为我们的中学在很多没有用的东西上浪费

了太多的时间精力,不但破坏了青少年人文素养的学习兴趣,也使学生对学习方法、目的等产生了错误的理解。为什么说很多东西没用呢?钱锺书数学考15分,吴晗数学考0分,你能说他们没有逻辑能力吗?他们的著作逻辑多严密。要说不学几何代数就没逻辑,那中国古代的人都是没有逻辑的,因为他们差不多只会简单的算数。数理逻辑可能很难,但比较狭窄,因为输入条件与输出结果往往非常简单和固定。涉及创作、人生、社会问题的逻辑,其条件和可能的结果则基本都是开放的,非常复杂,而这正是我们日常工作、生活所遇到的逻辑问题,特别是人文研究所需要的。中学生遇到的人生与社会问题相对简单,广泛的阅读,特别是文学阅读,才是培养人文逻辑的最有效途径。

国外大学最看重的是精神,就是对知识的尊崇、对知识无条件追求的精神;把大学的责任放在知识上,而不是强调过早与社会接轨,过于追求功利和实用。这样才有思想的自由,才有对知识追求的自由。我们的文学教育,还是应该引导学生多一点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性的东西,而不是把就业和赚钱当作他们学习的惟一目标。应该让学生明白:从人生的长远看,从踏入社会的最终竞争力争,人文素养是必不可缺的底子和催化剂。

晏杰雄:文学教育在培养人文素养中起着基础性作用。面对当前文学教育的困境,您在主持文学院工作中有什么具体措施或未来规划,让通过文学教育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成为可能?

欧阳友权:我和我身边的同事都为时下的大学文学教育而忧虑,也意识到改善文学教育现状的压力和责任。具体来说,我认为文学教育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努力:

一是复归文学教育的自觉意识和社会责任。近十多年来,大学生精神生活呈现粗糙化、粗鄙化,对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失去感觉,人就越来越物质化、功利化。在这个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时代,最容易形成人的精神危机:年轻一代心灵的缺失(空洞化,虚无化),情感的缺失,语言、文化的感悟力的缺失,所反映的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危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而民族文化血脉的传承得靠这一代年轻人,尤其是当代大学生。人是文化的主體,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文学教育实际上承担着国家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大任,关系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和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问题。因此,加强文学教育是当前国家各级部门的社会责任和公共问题,有必要加强对文学意义的认识,真正把文学教育落到实处。

二是改革教学,多元评价。文学教学应该以文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的文学敏感和文学热情,唤起学生的文学兴致和文学信仰。比如可以尝试“合作一参与式”教学模式,课前把学生分成若干三至五人的小组,课前教师提出一些启发性问题,让学生以小组协作形式,通过图书馆、网络等渠

道收集资料,写成阅读报告,上课时提交课堂讨论;课上教师对学生的报告做些必要的评价与补充,然后引导学生营造一种讨论、交流的氛围,激起学生的表达欲、交流欲,畅所欲言;课后根据课上讨论的内容,引导学生就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写简短的评论。此外,每学期可安排两三次学生课堂展演,要求学生认真阅读原著,找到切入点,制作PPT,在课堂上展现出来,全班围绕展演的内容和展现本身进行评价与讨论。而多元评价则是指“以促进教学为主要目的,由教学主体参与的,运用多种手段对学生的各种能力、学习过程及结果进行的形式多样的评价活动”。在文学教学中,可采取4+1的评价体系,即出勤、课外作业、课堂表现、论文加考试,各按一定比例计入总成绩。

三是让文学课堂成为诱人的艺术享受。文学教育者要把教学真正作为一门艺术去追求。我觉得至少有一点是应该去做的,就是大学老师应该和学生有更多的交流;把爱撒向学生。同时要掌握教学规律,念好文学课堂教学“透、熟、巧”三字真经。所谓“透”,就是把作品读透,把教材和教学大纲钻研透,进入文学内部,把握课程精髓,真正成为懂文学的专家和内行,而不能一知半解,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谓“熟”,是指课前认真准备教案,突出教学重难点,把教学内容烂熟于心,做到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所谓“巧”,就是精心设计教学的各个环节,巧妙表达教学内容,善于调节课堂气氛,增强文学教学的艺术性和感染力,使讲课真正成为一门艺术,让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还能得到美的享受,以文学的美感吸引学生,以文学性的教学方式增强文学课的魅力。

在网络时代,大学的文学教育也需要“打深井、接地气”,这个“深井”就是教育规律、人才培养的深井,这个“地气”就是文学品格、人文精神的底气。不管文学的生产方式和传播载体如何变,文学的精神品质和文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不变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顶层设计的大问题,也是一个观念调适的新课题。面对现代科技文明的迅猛发展,上网阅读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网络文学也已是蔚为大观。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教育,应该把科技革命的意义放到人文哲学的视野中来体认,以洞悉其形而上的价值内涵,走出“技术崇拜”和“工具理性”的观念误区,培育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让网络文明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长远关爱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从而在“科技—人—社会—自然”这个大系统中,实现网络文学与人的道德健全的统一、技术进步与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新媒体文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文学教育责无旁贷,改进大学文学教育时不我待。

“大学文学教育”访谈

文艺创作中的家国情怀弥足珍贵

□石 厉

只看重这地方, 因为在我看来哺育我的地方是神圣的。

数千年以来,人类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无法割舍、无法摆脱与家或家国的联系。也确实如古代诗人咏唱的,“哺育我的地方是神圣的”,神圣的故乡是人类所有艺术创作中永恒的主题。在这种意义上,文艺对政治无疑具有天然的影响力。也由于这样的关系,历史上的社会政治曾经干涉过文艺的自由表达,而文艺受到伤害后就试图要远离社会政治。比如在文学领域,多年以来文学曾试图撇清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无以复加地标榜自己“纯文学”的身份,似乎只有“纯文学”的标签才可以证明自己的作品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问题是有没有远离自己所生存的社会环境而纯粹表现自然与个体的所谓“纯文学”呢?我以为很难找到。即使有,这样的作品很难被认同和流传。纯粹表现自然的作品,如果没有人的视觉予以统摄,便没有意义;而任何个人的内心世界如果离开了家园与社会的关照,那么其最终的象征所指就是空虚和迷惘的。也缺乏被别人理解与接受的可能,作品同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事实上,现当代,那些大量沉溺于个人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文艺作品与家园、社会的关系极大,而不是没有关系,只不过表现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最具有说服力的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作品。

卡夫卡19世纪80年代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他短暂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德国文学的孤岛上的,只在生命的最后日子移居到柏林。当时在布拉格这个多瑙河王朝有着几十万人的北部城市,卡夫卡所属的德意志人只有两三万人,而他们这些作为统治阶层的德意志人又拒绝学习捷克语,捷克人也拒绝学习德语,尴尬的结局使他们既以自己的母语国家遥遥相望,又无法融于捷克的社会文化中。作为在语言和思想上极度敏感的卡夫卡,他小说中所呈现的悖论式的情感与孤独绝望的情绪,并不是纯粹个人化的,而是无法遏止的社会与国家在他内心深处落下的一幕幕投影。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审判》中主人公是一位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有一天在自己的寓所遭到了法院的逮捕,但是所谓的逮捕只是名义上的逮捕,法院既没有公布他的罪行,也没有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从此以后,他被迫不断上诉,而法院却不断推诿,日复一日,他的心理

压力越来越重,他要进入“法”的大门似乎越来越难,直到他耗尽精力,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依然不许他进去的“法”的守门人却告诉他,这扇门之所以没有其他人要进入,是因为这扇即将关闭的门就是为K而设的。你试图要进入,大门就会为你而设,这似乎成了一种更有普遍意义的象征情境。作为上层社会的一员,遵纪守法的K成为自己阶层所制造的“法”的受害者,因而“审判”不仅是“法”对他的审判,也是自我审判的开始。他的另一部影响颇大的长篇小说《城堡》,其主人公K以及周围的其他人人都被如梦幻一般的城堡的阴影所笼罩。城堡并没有聘请K为土地测量员,但却认可了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属于城堡管辖的村子并不大,可是管理这个村子的官员人数却比被他们管辖的村民多出好几倍;城堡的官员索提尼看上了村姑阿玛丽娅,而阿玛丽娅拒绝了他的粗暴要求,从此厄运就降临到她的家庭,尽管城堡并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报复措施,可他们却发疯病似的恳求城堡宽恕,为了能跑到索提尼的跟前,阿玛丽娅的姐姐奥尔卡竟然找到客栈去委身于每一个下贱的仆役,K终日守望着城堡,试图进入城堡,可是他却无法接近城堡。城堡表面上看,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器或官僚机构,但其实它更像一则寓言,在描述一群漂泊于精神故乡之外的游子们可悲、绝望的无助境遇,隐喻着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国家意识在文艺学术创作中出现,从方式上来说,古典主义时代基本上是明喻的方式,现代主义之后基本上是隐喻的方式,隐喻的方式使作品所要表现的情境可能容量更为丰富、更为普遍和深刻,但无论运用哪一种方式,任何作者及作品都无法超越国家、社会或国家的影响。那些极具个人化特点的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和反思兴趣,大概都是因为其象征所指仍然是社会及家园。历史文化与国家是我们主要的忧虑、欢乐、希望之所在,或者说个人的情绪及思索其来源及所指都离不开国家。家国的“神圣”就在于,当我的情感和思索与祖国的尊严相颀颀时,我愿选择我内心深处的那般“神圣”。

社会政治在不断走向文明,文明的政治具有全面的自觉与自信,自觉与自信的政治自然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人类杰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最终在宪法的范围内宽容文艺的自由表达,与文艺互相推动、互相进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文学梦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袁学骏的《文艺科学发展论》对文艺科学发展这个理论和实践课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大胆探索。

坚定的学理信仰。该书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框架分析和探索当代中国文艺发展遇到的种种问题,其中贯穿一条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百年来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巨变,正是因为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这个世界的思想武器,中国才有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和发展。文艺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建构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见证和书写了泱泱大中华的百年沧桑。所以,看待和解决近现代中国的文艺问题,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无异于舍本逐末、弃明投暗。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有了相等的理论自觉和理性分析,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能像以前那样把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某种特定现象的个别词句当着神圣的天条,更不能把其他知识体系都否定掉。”“不能孤立马克思主义,不能以学习马列为累。要看到,马列当年揭示事物本质性、规律性的理论何等不易,今天它还远远未到全面开花结果的时候。”

开阔的理论视野。如何看待文艺的本质和功能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而又常说常新的话题,也是任何一种文艺理论问题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宏阔丰厚、博大精深。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明确指出:文艺属于生产关系总和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这是对文艺本质特征的崭新界定,是对文艺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的科学定位,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人类对于艺术本质的认识。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另外两个基本观点也极为重要,那就是“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和“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前一个观点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对于后一个观点,不少人还存在模糊的认识,经常导致对文艺地位作用和功能的“窄化”和“矮化”。袁学骏全面深刻地理解和准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本质特征的重要论述,才奠定了文艺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特别是作者对于文艺生产具有不同于其他精神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规定,以及文艺生产具有形象化、情感化和审美性的特征的科学把握,为全书的理论铺设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显得纵横捭阖、游刃有余。尤其是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明确地把艺术看作人类掌握世界的四大方式之一的一独到领悟,从学理上建立在了鲜活的社会现实基础上,才使我们在文化和文艺上渐渐走向理智、走向成熟,才有了“我们不能娱乐至死,今天和将来我们都需要昂扬的前进声音”的呐喊。这些都是作者对于艺术本质的更高层次的把握和思考,也充分显示了科学理论武器的爆发力和穿透力。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文论重新振作,中、西、马三者融合的必然”,“走自己的路,应该以马为主,以中为主,以今为主”的理论思考,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兼收并蓄的理论追求和宽广开放的价值取向。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学者所具有的难能可贵的理论品质。

坦诚的学术风格。当今的世界,纷乱熙攘。袁学骏说:“在这个祸福相依、悲喜交加的多事之秋……科学发展观便是我们当前应对、破解一切难题的良方。”正是这种坦诚而且真诚的表达,才有了这个“可能”会招来“政治回潮”的文艺科学发展观念的真情书写。在这个市场和资本冲动的年代,文化本身的价值在不停地被肯定和被否定中摇摆,文化强国的良好愿望容易被文化“GDP”所代替,然而“我们需要激情燃烧,更需要深刻的反思与前瞻”(作者语)。一个缺少科学理论指导的民族和国家注定不会走得太远。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理解和前进,饱含了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赤诚和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睿智。“后现代主义最时髦却不是最先进,它最红火又最消极。它使我们看到过去被遮蔽的东西,但又带有明显的破坏性和历史局限性。”这种鲜明而辩证的学术思辨能力和胆识在当代学术界已经很难寻觅了。这种鲜明的语言风格在该书中随处可见,时而让人吟哦良久,时而让人振聋发聩。在总结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时,从不粉饰太平,讲求实事求是。对极左文艺路线的批评,用词也颇为大胆,入木三分、从不含糊,对“反对体验生活”、“反历史”、“反理想”、“反理性”等等的批评也一针见血。

学无止境。一部45万字的文艺理论著作,其可圈可点之处何止以上所言,但也多多少少有一些值得推敲和完善的地方。只是袁学骏的理论勇气和执着追求确实令人钦佩。

一个远离自己祖国的人,无疑是痛苦的,尤其是在精神上远离自己祖国的人,不仅会有巨大的痛苦,而且也会有难以克服的迷惘。国家的概念不仅包含有自然地理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包含有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的含义,尤其是社会政治,几乎应该是与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国家要素,对它的关心构成了许多人精神生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可能因为这样的原因,屈原遭遇政治社会(楚王庭)的放逐,他的内心遂产生了深重的痛苦和忧伤。他伟大的作品《离骚》就是这种痛苦的见证。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而离忧者,遭遇忧愁、痛苦之古语。正因为对他这种远离故国而产生的痛苦的描写,使他的作品有了光辉的背景和无穷的寓意。所以司马迁继续评价道:“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文学是这样,其他艺术也是这样。我国中古以后崛起的山水诗,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水墨艺术中成就最高者,并非只在于笔墨变化中的雕虫小技,乃在于“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语)观念影响下的对于家园与国家(包括伦理社会意义)的不尽留意与描绘,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山水艺术中抒情、写意的本质。唐诗人崔颢说:“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对故乡的忧思就是对祖国的忧思。清初的“遗老”顾炎武深切感慨:“人间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论。”那是由于他怀念自己心目中的“九鼎”与文化,他甘愿做一个前朝的遗民。无论时代怎样变,祖国还是自己的祖国。祖国的概念在学人的心目中是与自己的学道深切血肉相连的,有人可以随时运依附,有人也可以固守,有人可以殉国,有人可以随时代变迁而接受一个崭新的家国。但是宽泛一点,新人对旧人的宽容,不失为一种美德。近现代大学者、大诗人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痛苦,都是源于对自己曾朝夕相处的社会文化的怀念与执著,今人怎能对其肆意苛求?都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只不过有人沉入历史与虚幻,有人着眼现实与当下。欧洲人也一样,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俄底修斯历经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阻挠,九死一生也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这就是远古时代人类热爱自己祖国的见证。古希腊喜剧大师米南德在残存的喜剧片段中歌咏:

当我望见我的家乡的时候, 一切地方我都不看重,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的力作

□周由强